

加入世贸组织与国内税收关系的 九大辨析(下)

杨 斌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闽江学院, 厦门 361005)

关于入世后为了与国际接轨要推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税制仍以流转税为主体, 所得税占从属地位。这种税制体系带有某些计划经济特点, 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在许多人心目中, 只要通过降低流转税的比重, 提高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比重, 实行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就能实现所谓的“国际接轨”。这是似是而非的论调。

理论上讲所得税和流转税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一般地说, 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实现税收的公平目标方面有优势, 而流转税特别是增值税在提高税制的效率程度上存在长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时期, 我国不可能选择个人所得税(包括社会保险税)为主体税种。这是因为, 在这个时期, 个人所得税即使普遍征收也不可能推行于大多数就业人口, 而只能针对一部分具有较高收入的人口, 并且要实行低税率、广税基的治税策略。社会保险税不可能普遍征收, 通过它们所获得的税收收入不可能占税收收入总额的主要部分, 在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仅处于辅助地位。这是由如下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1. 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

虽然建国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 20 年来, 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综合国力达到可观的程度。但总的说来, 我国人

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 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处于还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

2000 年, 占总人口约七成的农村居民全年人均收入只有 2253.4 元, 城市居民全年人均收入 6280 元, 而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 5 倍。占总人口 60% 的低收入阶层拥有的收入或消费额只占全国总收入或消费额的 31.2%, 而占总人口 10% 的最高收入阶层拥有的收入或消费额却占到 30.4%。这种情况说明大多数人口或家庭所获得的收入还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并无能力缴纳个人所得税。据多年的实际情况分析, 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实际

陆百浦,《迎接新挑战 创建新税制》,载《中国加入 WTO 与税收改革》,第 30~32 页。

参见杨斌主编,《国家税收理论与实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84~90 页。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97 页。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282, the Table 5; p.280, the Table 4; p.291.

消费性开支一般均占居民全部收入的75%~80%，余下部分主要是人们通过省吃俭用留下的用于应急或保险或准备添置固定资产的储备，更何况我国推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税含价中，国家的大多数税款是居民在购物或消费时无感觉地支付给了国家。这种情况表明，不能以所谓收入向个人倾斜、个人储蓄存款增加作为理由说明个人所得税可以成为主体税种，因为收入向个人倾斜主要是向少数人倾斜、个人储蓄存款增加也主要是少数人储蓄存款的增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或以收入向个人倾斜、城乡存款余额的增长为理由说明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可普遍开征并成为主体税种是不充分的。

还有人主张可通过调整税制结构，即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减少流转税的比例的办法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这

也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且不说没有必要，即使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流转税是可转嫁税，流转税的负担落向何处，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所课征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求价格弹性。流转税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个人收入就会相应增加，流转税减税直接影响课税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即使假定流转税总体的减税幅度与个人收入总体增加幅度相同，具体到每一个人时，其获得的收入增加是不均等的，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进行税制转换的设计。再退一步说，税制的转换可以实施，但由于在征管上要面对相对少数的企业纳税人（特别是纳税大户）转变为面对众多的个人纳税人，要么征税成本会剧增，要么税款会大量流失，要保证财政收入不变，就必然要提高税率。流转税税含价中，负税人实际支付了税收却没有负担感觉，而转变为个人所得税，税收直接从收入中扣除，就会产生负担感觉，税率越高这种感觉越明显。

即使到了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普遍征收具备了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时，个人所得税的推行也要以巨大的税收成本为代价。西方国家在个人所得税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效率损失，以至于他们的一些学者和政府或国会要员主张“将所得税体系连根拔掉，并用另一种税制完全代替它”。这种情况也说明了要慎重对待将个人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的想法。

按我国官方标准，1999年我国的贫困人口只有3400万人。但是，按照世界银行每日1个国际元（按1985年的可比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最低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占中国人口18.5%左右。按这一标准1999年尚有贫困人口2.4亿。如果要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险制度，意味着社会中所有的人至少不要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生活。若对2.4亿贫困人口每天给予5元人民币价值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每年需要筹集4380亿的社会保险款，若再考

王春正，《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版，第191页。

就预算内财政分配而言，国民收入中国家支配的比例下降了，可以说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但若考虑政府税外收费因素，这个结论就不成立。当然，政府税外收费中相当一部分是转移到个人手中，构成其隐性收入，但这仍是少数人得益问题。

袁振宇，《关于税制结构改革的几点思考》，《湖北财政研究》，1995年第3期；计金标，《个人所得税政策与改革》，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20页。

徐镇庆、席西民、冯耕中，《个人所得税改革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冲击》，载项怀诚等著，《个人所得税调节谁》，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比尔·阿彻，《税制根本改革的目标》，见迈克尔·J·博斯金主编，《美国税制改革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the Table 5; p.280, the Table 4; p.291. Nicholas Stern, 2001, Overcoming Poverty in China, Delivered at Beijing University, June 14, 2001, p.6.

虑住房、医疗、教育等其它基本生活需要，要筹集的款项一定数倍于此数。但目前国家通过征税和税外收费得到的国民财富已达到极限。若强制推行，无异于全面的杀富济贫，平均分配国民收入，这将使经济效率急剧降低，完全不可行。这说明，在国家未能获得其它充足的财政来源时，社会保险税及其社会保险制度还只能主要推行于城市就业人口，社会保险税在税制结构中只能处于辅助地位。

2. 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货币化程度还比较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这意味着，在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实物经济，在城市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高福利，以及近年来所出现的个人收入来源多渠道、隐蔽化的趋势，个人的收入还不能完全通过货币收入或货币工资加以衡量。或者说账面的货币工资收入并不完全反映个人的实际全部收入。仅就国有单位而言就有下列四种情况¹¹：

第一种情况是账面上的货币工资收入基本反映了个人的实际收入；

第二种情况是账面上的货币工资收入加上所在单位的住房、

医疗、增产或增效奖金或创收奖金等才基本反映个人实际收入；

第三种情况是账面上的货币工资收入，加上所在单位的住房、医疗、增产或增效奖金或创收奖金，还要加上合法的职务所得（即因担任领导职务所享有的各种待遇）如专车、合理宴请（不包括公款私请）、与会议和考察等合二为一的国内外旅游、较高标准的住房和公费医疗等实际所得才反映个人全部实际收入；

第四种情况是第三种情况再加上所谓的“寻租”租金即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得的利益或收入才反映个人实际收入。

在这后两种情况下，个人账面上的货币工资只占实际总收入的很小比例。上述情况的普遍存在使得按职务或级别的等级工资制度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个人的实际所得因职务级别不同而差别，更因所在单位不同、所处位置不同、利用权力的程度不同而千差万别。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使得以货币工资收入为主要征税对象的个人所得税，成为“欺负老实人的税种”，极不公平。即账面上显性的货币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但实际收入不高的人要承担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负担；而从工资外能获得很多福利

（或各种待遇）或其它隐蔽性收入使实际总收入很高，但账面收入不高的人不必纳税或承担很轻的税负¹²。可以这么说，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得越严格，所造成的不公平程度就越高。

个人所得税天然地以个人收入的货币化、账面化为前提。然而当非货币工资性的收入占过大比重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会束手无策。因为税收成本的最小化或治税的效率原则的制约，消除了对所有隐性收入进行调查和对所有实物收入进行折算的可能性。税制的公平和实行结果尽量与税制目标一致是个人所得税的灵魂，在我国要实现个人所得税的公平目标，需要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工资外的各种福利性分配，消除以权谋私现象，使个人账面上的货币工资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其全部实际收入。而在我国要完成这样的制度变革，还需要漫长的岁月。由此可见，治税的效率和公平目标不可能通过个人所得税得到兼顾，这决定个人所得税难以充当主体税种的职责。

3. 我国特有的以面子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文化环境

普遍推行的个人所得税天然地以纳税人主动申报、税务局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为基础。

¹¹ 杨斌，《治税的效率和公平》，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65~366 页。

¹² 杨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两个核心问题》，《税务研究》，1999 年，第 10 期。

但在我国很难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行这样的模式在我国没有文化及其体制基础。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面子、人情和关系。“明智”的纳税人往往要在营业活动开始时就密切注意与税务执法人员和其他有关政府官员的关系,建立利益共同体并设法逐步强化稳固,一旦遇到违法事实被揭露,就可动用人情关系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人们对违反税法遭处罚的预期成本是很低的,很少人会主动申报其全部所得,绝大部分人申报的材料不实,在这种环境之下,税务局要稽查的申报表就会过多,不进行全面审计,偷漏税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当这种状况达到一定范围和规模时,特别是蔓延开来时,就会出现法不责众,难以有效控制的局面,会进一步强化不守法而获利(即老实人吃亏)的社会心理;而进行全面稽查,非税务局人力、能力所能为。即使建立起先进、系统的计算机网络,由于信息的不完整,也无法起有

效的作用,计算机管理的基础是输入的信息必须绝对可靠和完整。

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所得税不可能成为主体税种。就整体而言,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将主要在于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因入世而强制要求其与国际接轨是徒劳无益的。

关于入世后只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因此入世后我国增值税也要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如此可以减少大量进口产品由于实际税负低形成的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减轻对幼稚产业的冲击,还可以鼓励国内这些原本税收负担较重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获得较快的发展¹³。但是当前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

由目前的生产型变为消费型,办法无非两条,一是保持总体税负不变,即保持增值税

收入水平不变,通过提高税率来弥补税基缩小带来的收入减少。据计算在收入总规模不变的前提下,税率要从现在的17%提高到23%¹⁴。假定最终消费品的价格维持不变,因最终消费品采用价内税,税含价中,消费者不承担增加的税负(实际上当前我国消费市场疲软形势还在继续,不可能通过提价来消化增税)。那么在总体税负不变的情况下,税收负担只能在企业间均衡。实际上就是减轻固定资产比重高的企业、从事自然资源开采或利用的企业的税收负担,而增加固定资产比重较低的加工型企业的税收负担。而目前这些企业多数面临比较大的困难,亏损严重,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高,增加的税收难以转嫁给消费者,对他们加税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提高税率难以实行。另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税率不变,实际上就是通过减少财政收入,减轻固定资产比重高的企业的负担。如

¹³ 董建英,《加入GATT/WTO的财税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5期;王国华、张平国,《试论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涉外税务》,2000年第7期;黄旭明、姚稼强,《WTO与中国其它各税制度改革的研究》,《涉外税务》,2000年第7期;韩绍初,《以入世为契机 把我国税制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涉外税务》,2000年第8期;唐志萍,《加入WTO对税收的影响和对策》,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130~131页;酆志刚,《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的思考》,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374~375页;深圳市地方税务局,《中国加入WTO对我国税制的影响及对策》,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411~413页;邹欣祥,《“入世”与两个主体税种的进一步完善》,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430~432页;何忠仁,《加入WTO与我国增值税制改革初探》,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449~450页;孙梓华,《增值税“入世”应对》,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454页;李齐云、刘普照、王新丽,《加入WTO后我国税收的应对之策》,《税务研究》,2002年第3期;刘金良,《适应加入WTO新形势完善我国增值税制》,《税务研究》2002年第3期。

¹⁴ 中国税务学会《完善增值税问题》课题组,《完善增值税问题的研究报告》,《税务研究》1999年第1期。

果允许抵扣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财政要减少收入 573 亿元，固定资产存量所含增值税达 4840.12 亿元^⑤。如果对固定资产存量所含增值税不予抵扣，新旧企业难以公平竞争，如果对固定资产存量所含增值税分 5 年抵扣，每年要抵扣大约 970 亿元。两项合计，每年估计会影响财政收入约 1543 亿元。当前我国财政已经是多年连续赤字，债务依存度越来越高，2002 年预算安排的财政赤字高达 3098 亿元，发行国债 5929 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比例达 28.08%^⑥。如果考虑地方各级政府的隐性债务，债务依存度还要高出许多。在这种财政形势下，国家无力承担每年 1543 亿元的减收压力。此外，增值税类型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会出现税收收入不均衡问题。在消费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购进或完工投入使用当年，应抵扣的进项税额大量增加，可能会出现负增值税。而在其他年份应交增值税相对数量要大，产生企业不同时期的损益不均衡和国家税收收入的不平衡。会出现经济增长越快，新增固定资产越多，税收收入越

要下降的局面。因此，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不可行。

我国增值税的发展方向必定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式增值税，其主要特点是：对 90% 左右的从事商品和服务销售的纳税人按传统的办法即全值课征，进项税额不抵扣，按单一税率（如 5%，也可设立档次不多的几档税率），征收名为增值税的商品和服务税；对其余 10% 左右的较大规模纳税人（可保留一般纳税人的名称，或称标准纳税人更合适），以账簿记录和专用发票为数据基础，按收入型增值税的原理，设置单一税率征收增值税，以解决传统全值型流转税重复课税的弊端。这样的增值税，制度较不理想却适合中国国情，能运行顺利。只有运行顺利，制度规定不走样的增值税，才能使设计者在制度中表达的公平和效率的主张落到实处^⑦。

关于出口退税率要达到征多少退多少的问题

不少专家认为，出口货物退税要完全符合 WTO 规则。根据公平竞争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

要求，出口退税政策需要进一步规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出口退税率要达到征多少退多少^⑧。

目前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在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并且部分出口货物的退税率低于税率的情况下，如果按照征多少退多少的完全退税原则，确实存在退税不足的问题。用于出口产品生产的投入品（包括货物和服务）已纳流转税中不仅包括可退的非固定资产投资品增值税，还包括不可退的固定资产类投入品已纳增值税、服务类投入品已纳营业税。

但是笔者认为应当以公平竞争为原则而不是以“彻底退税”为教条设计出口退税政策。

要解决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中国企业和企业的矛盾，有必要重新考察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论基础。现行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由于出口商品进入进口国后，进口国还要依法征收国内流转税，因此为了避免国内流转税的双重征税，促进国际贸易，出口国要实行退税政策，征多少退多少即彻底退税，使其出口商品以不含流转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出

^⑤ 李智祥、刘广仲、张宝婷，《增值税转型方案的设计与测算》，《税务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⑥ 项怀诚，《关于 200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02 年 3 月 6 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02 年 3 月 7 日第一版。

^⑦ 具体参见杨斌，《西方模式增值税的可行性和中国式增值税的制度设计》，《管理世界》，2001 年第 3 期。

^⑧ 黄彦，《加入 WTO 对我国出口退税的影响》，《中国税务报》2001 年 10 月 26 日第 3 版。

口退税的本意不是为了对出口商品实行财政补贴,而是为了使出口商品能与进口国地产品或来源于其它国家的商品公平竞争,即竞争的成败不受国内流转税负担的影响,这是税收中性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不同的国家由于税制结构不同商品的流转税负担不同,一般地说实行以所得税为主的国家,其流转税负担比较轻,因而流转税的税率也会规定得比较低;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国家,其流转税负担比较重,因而流转税的税率就会比较高。税收的差别政策还会造成不同商品的流转税负担不同。由此可知,所谓“彻底退税,以不含税(流转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并没有解决国际贸易中公平税负问题。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商品价格中流转税相对含量高。因此如果我国的商品出口到以所得税为主体且流转税税率较低的国家,在其它条件相同(特别是包含所得税和其它税在内的全部税收占价格的比例相同、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出口商可获得一笔数额等

于退税额和进口国国内流转税额差额的额外利润,如果出口商放弃这一额外利润的部分或全部,就能降价出售商品,在竞争中取胜,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个差额实质上是国家对出口商的财政补贴,这就超出了出口退税的本意。由此可见,理论上讲,为了实现国际贸易领域的税收公平,必须放弃“彻底退税”教条,按照进口国的税制结构和流转税分商品种类的差别税率情况,分国别、分商品设计不同的出口退税率,通过退税使我国出口商品价值的税收含量与进口国商品价值的税收含量相同,从而达到既避免双重征税又公平税负的目的。实际操作中,为了简化起见,可按国家类别和商品类别制定不同的退税率,而不是一个国家、一种商品定一个退税率。在此前提下,也可通过差别的出口退税率实现出口产业、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节。

为了鼓励服务或货物的出口,必须扩大退税制度的范围。一方面在退税主体上,使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人在出口货物或服务时也能享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退税待遇。另一方面在退税的客体上,要拓展到服务类商品已纳流转税,要拓展到固定资产类投入品和服务类投入品已纳流转税。但考虑到遵守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反补贴的规定,对用于出口货物或服务生产的投入品的退税额不能超过其已纳累积间接税额。

关于入世后要新设置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为了捍卫我国生产者的权益,在税制体系中要单独设置一个税种即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⑨。这也是不正确的看法。

如果外国进口产品的倾销造成了本国产业的损害或损害威胁,进口国可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以保护本国产业,这些措施包括临时措施、价格承诺和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是对倾销和补贴的报复性措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种,

^⑨ 董建英,《加入GATT/WTO的财税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5期;王国华、张平国,《试论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涉外税务》,2000年第7期;黄旭明、姚稼强,《WTO与中国其它各税制度改革的研究》,《涉外税务》,2000年第7期;李万溥、马衍伟,《加入WTO:中国税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95页;郦志刚,《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的思考》,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374~375页;深圳市地方税务局,《中国加入WTO对我国税制的影响及对策》,载《中国加入WTO与税收改革》,第411~413页;李齐云、刘普照、王新丽,《加入WTO后我国税收的应对之策》,《税务研究》,2002年第3期。

因为它们没有明确的法定纳税人，纳税人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加以确定；倾销现象或补贴现象的发生还不是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的必要条件，还须经过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并且能够确定倾销或补贴对贸易伙伴国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即使这种损害最终能够确定，贸易争端解决首先要通过谈判，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只是最终的报复手段；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征纳双方关系也不像一般税种是国家及其居民或公民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贸易争端的关系；征税对象即税基在不同的案例中均不同，没有像一般税种那样来源稳定确实，且是不断发生的。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在倾销或补贴所造成的损害消除之后就必须马上停止；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也没有法定税率，反倾销税金额等于或小于倾销幅度，而倾销幅度或补贴金额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加以确定；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实行机关也不可能是税务局，而只能是外贸主管机关，不可能以获得财政收入为目的。因此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与其说是税收不如说是补偿性措施，不应当将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看作入世后必须增设的新税

种，何况我国已经发布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条例，已经将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列为防止破坏公平贸易的倾销或补贴行为的措施之一。

关于入世后税收立法、政策、征管方法不能完全自主决定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税收政策决定更改要经别国同意并且要定期接受政策评审²⁰。还有人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税收立法和行政管理不能完全自主决定，而要按世贸组织规则办事，与世界接轨。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其原因在于对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存在误解；对入世应持有的基本态度把握得不够准确；对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也缺乏全面了解。

首先，世贸组织协定属于国际法范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必须得到遵守，但国际法无权改变国内法，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均无权干预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一方面我国既然已经入世，就应当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的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认真履行世贸组织协定，

通过法律明确世贸组织协定或国际税收协定优于国内法律或国际协定属于特别法，并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的普通法不得优于特别法，除非特别说明其优于旧的特别法”原则，认真履行包括世贸组织协定在内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但另一方面，入世并不意味着国内立法或具体管理办法或制度确定均不能自主进行，而是相反，我国作为主权国家仍然可以自主地确定任何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只不过在涉及国际贸易方面时要遵守世贸组织协定的规定。

其次，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职能是对各成员的全部贸易政策和做法及其对多边贸易体制运行的影响进行定期的集体评价和评估。但是，各方的具体措施与世贸组织协定、条款的可比性不受审议，由各成员自行检查。对每一成员的审议是轮流进行的。因此，贸易政策审议不是对一国贸易政策、法规的审查，更不是对一国主权的干预，它仅仅是在世贸组织规则下按一成员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中的具体做法与世贸组织规则进行比较。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是基于成员政府提供的详细叙述其贸易政策的报告和

²⁰ 吴俊培、庞凤喜，《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税收应对措施》，《涉外税务》2000年第6期。

世贸组织秘书处所独立准备的一份详细的报告进行的。这两个报告以及贸易政策审议机构的审议记录将在审议会后立即公布。贸易政策审议将在经常和定期基础上进行。该机制也不能作为履行各协定项下具体义务或争端解决程序的基础,也不能向各成员强加新的政策承诺²¹。审议机制认为,一方面政府在贸易政策问题上决策的国内透明度对各成员的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的固有价值,鼓励和促进在各自体制内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也承认国内透明度的落实必须以自愿为基础,并考虑每一成员的法律和政治体制²²。因此所谓入世后,国内政策的制订和实行要听从他国意见,不能自主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审议机制以及透明度的要求只限于与履行入世所承诺的义务有关,而且是在自觉自愿、充分考虑了一国法律和政治体制特点后进行的。它不能限制各国制订政策的自主权。

再次,入世后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自己捆起手脚,听任摆布,而应当自主入世。入世协定是过去时,而经济贸易状况是进行时和将来时,只有政府真正始终把中华民族的最大多数人的

最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为了少数跨国买办集团利益服务,或仅仅为了顾及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面子”,入世对中国就没有根本的不利影响。这一点才真正需要学习美国,美国虽然做了许多承诺,但一旦遇到这种承诺的对象损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或影响其政治利益时,总是选择保护措施,哪怕引起全世界的谴责和贸易争端。我们应将世贸组织

中的灵活性规定用尽用足,采取一种态度,明确之处用尽、不明确之处不小心过之,不惧争端。入世是为了方便吵架而不是害怕吵架。入世后国内税收政策安排还有很大的空间。补贴被起诉的条件是很苛刻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不会受到多少限制。

(原稿有2万余字,限于版面本刊有删节)



²¹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第A条。

²²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第B条。